

女权·红楼·子宫家庭

◎ 帅雯霖

提起女权主义,可能有些男士心里犯嘀咕:嗨,现在的女人越来越厉害,动不动来个“女权主义”什么名头,好给男人们一个下马威。某位男性老师也曾好心告诫我,别太过习用“女权主义”方法,这玩艺容易走火。而其实,“女权主义”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带有浓郁的火药味了,代之以它的是“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等中性字眼。

近日阅读了一本由澳大利亚女学者路易丝·爱德华兹(Louise P. Edwards)用女权主义方法研究《红楼梦》的英文著作《清代中国的男女:〈红楼梦〉中的社会性别》(Men and Women in Qing China:gender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 / Leiden; New York; Köln; Brill, 1994),觉得颇有趣味。她把完全西式化的现代的纯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最辉煌的古典名著中,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她是怎样给一位中国古典小姐穿上西式洋装的呢?

在爱德华兹的著作中,作者并不急于想把曹雪芹的瓜皮小帽换成西式礼帽,而是想量体裁衣,探讨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为什么男权主义的性意识能在中国得到合理化和正常化?”以及“曹雪芹是如何反映他那个时代的性意识的?”

在用女权主义方法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时,这位西方女学者发现,尽管曹老先生借宝玉之口感叹“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怎么清白的女儿身一挨男人就变得污浊了呢?”但是他的无意识的男权主义思想又使他赋予王熙凤这样有才干和魄力 的女子最后以悲惨的结局:她的经血失调,象征她的败落;她的死了对她僭越男性的惩罚。这些都是曹雪芹男权主义意识在作怪:女人就是女人,不该在意识中超越男人。

在探讨贾府的男女关系时,爱德华兹提到了一个

有意思的概念——“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一九七二年,美国人类学家玛杰里·沃尔夫出版了《台湾乡村妇女与家庭》一书,向妇女在中国社会中仅仅是受害者的看法提出挑战。在对台湾乡村家庭长期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她提出了“子宫家庭”的新概念。沃尔夫指出,一个女子出嫁后,她在婆家的地位随着生育儿子而产生变化。由于中国家庭中男孩的早期教育多由母亲来承担,因此通过教育,母亲培养起儿子对自己的感情维系,待儿子成长后母亲即可通过儿子来扩大自己在男性统治的家庭中的影响和权力;但是为了巩固自己通过儿子获得的 家庭地位,母亲往往又需要以传统的忠孝观来教育儿子,维护儿子在男性中心家庭里的统治地位。这样,这个以母亲为中心的“子宫家庭”在男性统治的家庭运作过程中既巧妙地向男性统治提出了挑战,又巩固了男性统治的传统。这种对妇女在男性中心社会中所起的复杂作用的探讨是早期妇女研究中不常见的,对中国妇女研究者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贾母、王夫人的权威就是通过“母亲”角色获得在男权社会的权力;在另一个方面,这位女学者又提出贾母、王夫人等作为慈母对儿子的溺爱是导致孩子堕落的原因,同时作为制衡作用,父亲以“严父”的角色出现,纠正了“慈母”的教育失衡。在这里,“严父”在道德上高于“慈母”,这是不是曹雪芹的男权无意识的表现呢?女子,总是无德,无远见,是家庭败落的原因。

这本书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西方女学者的洞鉴与慧眼,她们一眼看到了中国父权社会的内部,也一眼看见了曹老先生骨子里的男权主义。在这里,我们就不能随便地主观认为用女权主义方法研究中国作品是洋道士穿马褂而已。跳出匡庐看匡庐,确是别有天地的。